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库

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

内乱与抗争

1966—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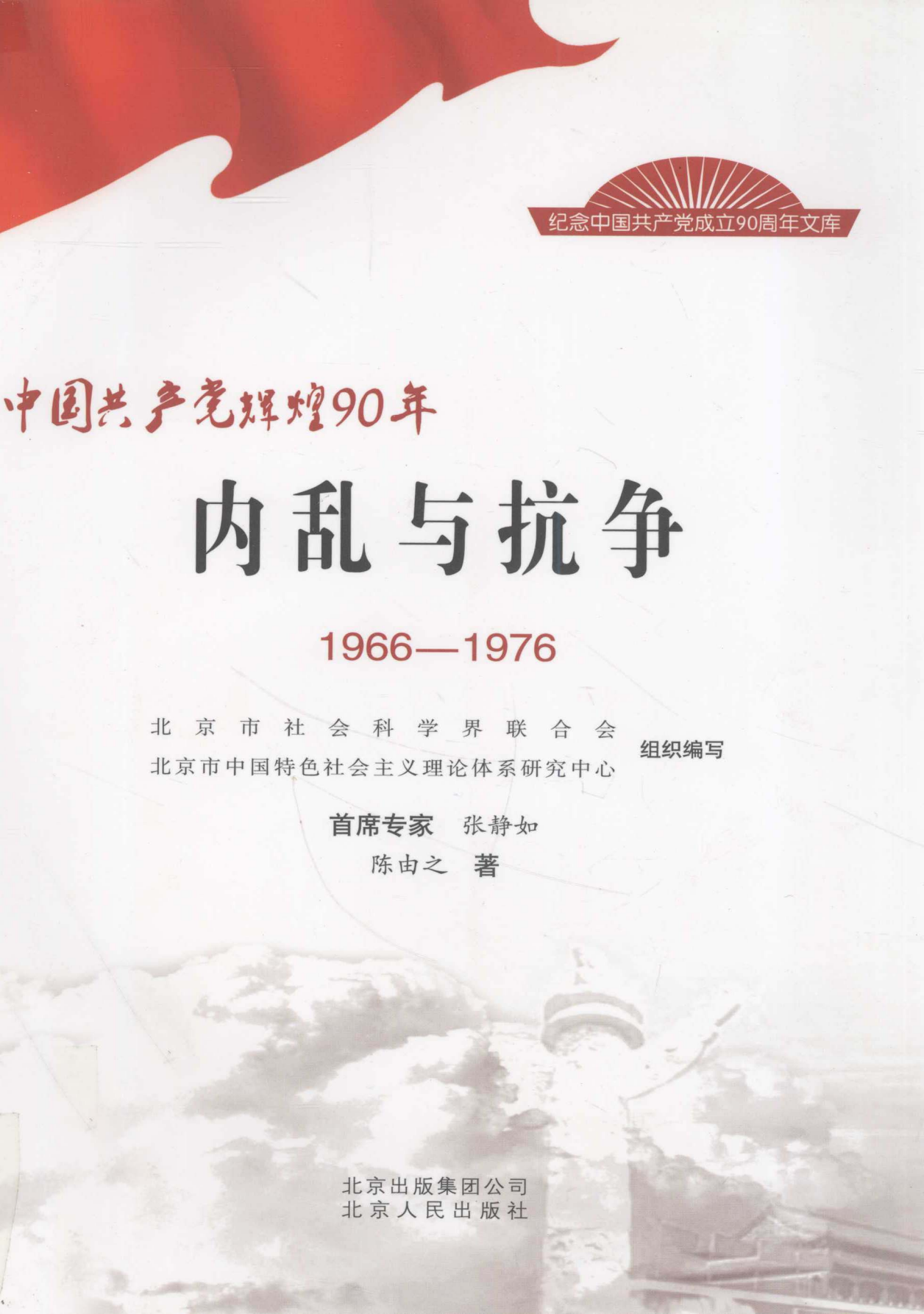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首席专家 张静如

陈由之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

内乱与抗争

1966—1976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组织编写

首席专家 张静如

陈由之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内乱与抗争 : 1966 ~ 1976 / 陈由之著. — 北京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6

(中国共产党辉煌 90 年)

ISBN 978 - 7 - 5300 - 0316 - 9

I. ①内…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
1966 ~ 1976 IV. ①D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7558 号

中国共产党辉煌 90 年

内乱与抗争 1966—1976

NEILUAN YU KANGZHENG 1966—1976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首席专家 张静如

陈由之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21.5 印张 385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0 - 0316 - 9

定价: 5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总 前 言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90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90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辉煌成就的90年，是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不断发展壮大的90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策划、组织、编写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库》，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中国共产党建设90年》和《90年中人与事》三个系列，共18种作品近700万字。《文库》旨在从党史、党建和奋斗中的共产党人三种不同视角，反映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文库》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点出版物。

为做好《文库》的组织编写工作，确保《文库》及时、高质量地出版，成立了以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傅华和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史秋秋为主任的《文库》编委会。编委会组建伊始，就对《文库》的编写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和学术规范，强调书稿撰写要有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基本史实、基本观点准确，既要体现近年来研究的新材料、新进展，又要有新视角、新观点，以确保《文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知识性，将《文库》打造成精品。《文库》的编写组织工作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我们聘请了党史、党建领域的著名学者张静如、姚桓、刘陈德分别担任《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中国共产党建设90年》、《90年中人与事》的首席专家，负责对具体选题、作者队伍、内容框架以及时间进度把关，并负责最后统稿、定稿等工作。这三位首席专家既是组织者，又是作者中的一员。他们尽职尽责，不辞辛

苦，付出了大量心血。各位作者在繁忙的教学或工作之余，认真研究，勤奋写作，保证了书稿的按时交付。《文库》或许还未臻完美，但确是作者潜心研究和深入思考的成果。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对《文库》的编辑出版高度重视，给予了指导和支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办公室不仅具体承担了《文库》的策划、组织、统筹协调等日常工作，还为《文库》的撰写和出版提供了资金支持。北京出版集团领导和该集团人文社科图书出版事业部的编辑团队，为《文库》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在《文库》即将付梓之际，我们对上述单位的同志们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们期望《文库》能够为党史知识和党建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普及发挥应有的作用，期待广大读者对《文库》给予批评指正。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文库》编委会

2011 年 5 月 18 日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
一、“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
什么是社会主义?	1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世界与中国	5
毛泽东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	7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够被发动起来?	10
二、“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2
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12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纪要》	17
“彭、罗、陆、杨”事件	19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20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五一六通知》	20
“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	23
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两种方针	25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30
四、走向“天下大乱”	34
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连	34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38
“踢开党委闹革命”	41
“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农业领域	42
第二章 从“天下大乱”到党的九大	47
一、“自下而上”地全面夺权	47
“一月夺权”	47
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夺权”	51

二、二月里的正义抗争	53
夺权引发大乱	53
“二月抗争”	55
三、在动乱中限制动乱的努力	61
大乱中的两难处境	61
解放军“支左”与军管	62
支农、支工和军训	64
四、“全面内战”与天下大乱	66
动乱升级，趋于失控	66
“天下大乱”达到“顶峰”的三个月	71
毛泽东、周恩来采取有力措施抑制动乱	74
五、“全国山河一片红”	77
反“右倾翻案”再次引发动乱	77
再次采取断然措施制止新一轮动乱	80
“工宣队”进驻学校	81
“全国山河一片红”和革委会体制	84
六、党的九大	88
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88
中国共产党的九大	92
 第三章 “斗、批、改”运动	98
一、九大之后的形势与格局	98
九大前后的政治格局	98
平息大乱余波	101
战备高潮	103
二、“斗、批、改”运动	106
“斗、批、改”的由来	106
“斗、批、改”的“样板”	108
三、“斗、批、改”的几项具体内容	112
“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	112
革委会建设	117
整党建党	120
教育革命	12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28
干部下放劳动	131

四、“抓革命、促生产”	134
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	134
“跃进”、“翻番”	135
“五小”工业与社队企业	138
五、思考与觉醒	139
 第四章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146
一、政治投机与拉帮结派	146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投机	146
在动乱中恶性膨胀的宗派	149
两个阴谋集团的勾结与争斗	150
二、九届二中全会	153
林彪不再“紧跟”、“照办”	153
两个阴谋集团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冲突	155
九届二中全会	157
三、“批陈整风”	161
审查和批判陈伯达	161
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	164
“批陈”中的“整风”	165
江青集团趁机扩张势力	169
四、“九一三”事件	170
林立果与“联合舰队”	170
毛泽东视察南方及谈话	173
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覆灭	175
 第五章 周恩来领导的 1972 年整顿	178
一、“批林”与“整风”	178
采取有力措施稳定形势	178
“批林整风”中的困惑	180
二、毛泽东对极左思潮的反思	183
对极左思潮强烈不满	183
“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183
三、周恩来领导的 1972 年整顿	186
周恩来反对极左思潮的一贯立场	186
排除各种障碍，落实干部政策	188

批判极左思潮, 落实经济政策	190
打开对外经贸新局面	194
对农业政策的调整	197
落实党的教育、科技、文化等政策	200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206
1972 年批判极左思潮的高潮	208
四、周恩来整顿的中断	210
江青集团对批判极左思潮的疯狂反扑	210
毛泽东态度的转变	211
周恩来勉力苦撑, 继续批判极左思潮	212
周恩来整顿的中断	214
五、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217
党的十大的筹备	217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	218
六、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	221
“天下大乱” 对外交工作的严重破坏	221
缓和中美关系和中日建交	2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24
对外关系的新局面	225
 第六章 从“批林批孔”到四届全国人大	 227
一、再度造成动乱的“批林批孔”	227
“批林”与“批孔”相挂钩	227
“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搞乱社会	230
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236
二、围绕四届人大组阁的斗争	240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240
江青集团“组阁”阴谋的破产	244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思索	246
三、四届人大和 1975 年宪法	247
四届人大的代表构成和正式召开	247
1975 年宪法的修改过程及其特点	248
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250
恢复全国人大常委会, 确立国务院领导核心	251

第七章 邓小平领导的 1975 年全面整顿	254
一、整顿的开端	254
制定 1975 年国民经济计划	254
以解决铁路问题为突破口	255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	258
二、整顿在工业、财经领域推开	261
把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	261
围绕反“经验主义”的斗争	264
制定加快工业发展的章程	267
三、军队的整顿	269
绝不容许野心家插手军队	270
加强国防工业	272
四、整顿深入展开	275
整党的初步措施	275
中国科学院的整顿	279
教育界的整顿	284
文艺政策的调整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289
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和全面整顿的部署	293
五、四五计划的完成	297
 第八章 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	299
一、全面整顿中断	299
评《水浒》的风波	299
毛泽东态度的转变	301
“教育革命大辩论”	305
二、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	306
周恩来逝世	306
毛泽东关于“打招呼”的多次谈话	308
“四人帮”加紧“批邓”	311
三、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	313
人民不满情绪高涨	313
天安门事件	315
悲壮的结局	316
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升级	318
“四人帮”操纵“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318

全国形势再度恶化	320
五、唐山大地震与抗震救灾工作	321
六、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322
毛泽东逝世	322
“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活动	326
一举粉碎“四人帮”	328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一、“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什么是社会主义？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毛泽东的这段话，集中地表明了，在苏共二十大前后，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当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解放思想，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并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这一认识反映了当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愿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正确方向。但是，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另一个更为复杂、艰巨的任务又摆在人们面前：如何解放思想、超越苏联模式？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怎样探索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证明，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苏联模式就能走上改革的坦途。在改革苏联模式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各国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有的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进行这一探索，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大跃进”是不成功的，但它却反映了超越苏联模式的强烈愿望；“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也与苏联模式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对苏联模式的成功改革，除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入观察，对本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外，还要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数十年的丰富实践和时代主题的巨大变化，解放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当代化。同时，还必须要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对时代及其发展趋势深刻而全面的把握。

特别重要的是，顺利的改革还得依靠本国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是说，需要将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物质基础。这正如在一个小农经济占多数的国度里，对价值规律、现代管理、现代信用制度等等的理解、重视和运用，远不能与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一样。同样是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观察和认识，比较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结论往往存在许多明显的区别。

毛泽东用于改革苏联模式的思想资源中，除了对苏联革命与建设实践的观察和思考外，还有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独特理解，有中国历史上对大同世界乌托邦的种种描述及他早期革命生涯中“新村”活动的烙印，更有中国革命战争时期丰富而又成功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经验的影响。正是这种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中国当时改革的许多特点。1958年“大跃进”的尝试，虽然带有超越苏联模式的强烈愿望，但其中许多内容却往往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相左。例如：忽视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对现代管理、制度、法制的陌生和轻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可能产生“资产阶级法权”的忧虑；崇尚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乃至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进行经济建设；对物质利益可能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深切忧虑；相信简单的、不富裕的生活能产生和保持足够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反过来又可以对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等等。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严峻的困难局面推动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国情，纠正错误，调整经济、政治关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调整既是对传统模式的修复，也是对它一定程度的改革。比较实事求是的调整和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果，扭转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困难局面。更重要的是，这些努力都在不同方面反映着某种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问题在于，在当时的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尚未取得明显进展，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仍然步履蹒跚、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大背景下，在中国还落后的经济现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着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的条件下，在政治方面的调整落后于经济调整的环境中，加之当时整个国际形势方面的诸多因素，中国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这样，调整时期产生的这些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新举措与有关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发展了。从1964年起，毛泽东把“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这种忧虑从深层次上反映了当时我国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一些矛盾。

1966年5月7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夕，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个报告的批示（即《五七指示》）中，又一次比较系统地谈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看法。他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除打仗之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我们的各抗日根据地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他认为，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最后，毛泽东指出，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他当时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设想。这些设想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在随后的调整时期，毛泽东根据自己对1958年经验的总结和思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索。他放弃了“大跃进”时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发展了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长期性的认识。随着党内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意见分歧的加深和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在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中进一步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这些新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一些重要文件，如《五一六通知》以及《五七指示》中比较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五七指示》与“大跃进”、人民公社有许多近似的地方，它反映出毛泽东心目中所向往和憧憬的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特征。这种社会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它将阶级斗争作为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保障，对生产者个人来说，则以阶级觉悟、革命精神作为压倒一切的激励源泉。在这个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实行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对于商品生产，虽然不能不借助它来发展经济，但因其资产阶级的属性，必须加以限制。社会分工虽然为当前生产所必须，但因其会导致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平等，而要加以限制，并应创造条件使其逐步缩小。在分配领域中，也应缩小差别，甚至可以实行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因为物质利益总会诱发人们的物质欲望，直接威胁到道德的纯洁和高尚，导致精神的堕落，而革命的理想和阶级觉悟能够提供最强大和持久的动力，使劳动者能够并乐于完成任何艰难困苦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种社会可能并不那么富裕，但这可能正是它的优越性所在，因为在一个富裕或高度富裕的社会里，人们往往会付出精神堕落、意志消沉和社会主义变质的代价……

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的这些认识，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对未来社会的某些构想，也包含了他想超越苏联模式弊端意识；既有我国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的深刻烙印，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影响。《五七指示》所展示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虽然包含有一些大胆的设想和富于想象的预见，反映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一些尖锐批判，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追求，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是不现实的。它忽视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一种社会形态的决定性作用，脱离了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时期的主题，忽视了商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它把以残余形态存在着的阶级斗争当做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希望用不间断的阶级斗争和限制分工、限制差别、限制物质利益等方式来取得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这些都带有经验主义和空想主义的色彩。毛泽东提出的这些设想，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抗日根据地时已经这样做了，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在革命战争时期有效的经验，在军队里是正确的做法，未必能无条件地推广到整个社会，特别是推广到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和改革，但这必须以生产力的现状与发展为出发点；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弘扬战争年代的革命传统和英雄主义气概，但却不能简单地直接搬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但它也是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正确与否也必须由实践来检验。

1966年5月15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五七指示》并称这一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月1日，为庆祝建军39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公布了《五七指

示》的部分内容，并给予它极高的评价。《五七指示》中的基本思想和一些具体要求，在1969年后开始的全面“斗、批、改”运动中开始被全面付诸实施。它深入到几乎所有部门和领域，表现为无数种实验、典型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这种对社会主义认识及其在党内引起的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追求，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世界与中国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世界范围形势的左倾化、激进化是相关的。当时，中国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有一个经典的概括：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4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概括还是比较贴切的。当时，虽然在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集团或阵营中，分别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激进化和保守化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激进化处于主导方面。

自50年代起，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武装斗争此伏彼起，捷报频传，一浪高过一浪。旧殖民主义国际秩序土崩瓦解，资本主义阵营矛盾重重。对第三世界来说，60年代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革命运动高涨的年代。武装起义、游击战争、军事政变、外国干涉、血腥杀戮、政治动荡成为这十年的鲜明标记。在60年代，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20世纪的最高潮，基本上完成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使命。“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毛泽东诗句）、“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叶剑英诗句）、“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便是这种振奋人心的形势的真实写照。当时那些雄姿英发、无私无畏、浴血奋战在丛林莽原和崇山大泽中的格瓦拉式的游击战士，长期成为全世界进步青年和西方左翼激进派心目中的偶像。

美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到处伸手，推行霸权主义，支持各种反动势力，镇压、破坏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受到各国热爱和平、追求进步人民的激烈谴责。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弊端的左翼思潮、学生运动和反对种族歧视运动也在迅速发展。特别是60年代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后，西方发达国家内广泛的反战运动更是空前高涨，沉重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当局。1968年，从西方世界的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以及日本等，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国形成一片学潮。青年人对现状的愤怒和反叛，汇成一股汹涌澎湃的大潮。1968年5月，发端于年初的法国学生运动迅速达到高潮。学

生与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终于酿成5月10日的“街垒之夜”。整个巴黎烽烟四起，处处街垒。一位学生领袖声称：“今夜街上所发生的一切是整个一代人在反抗某种社会制度。”5月28日，总人口5000多万的法国有1000多万人罢工、罢课，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五月风暴”中，学生、工人、市民的游行队伍高举着胡志明、格瓦拉、毛泽东的画像，赫然在目的还有“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等大幅标语。当时，毛泽东的思想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以致一位著名法国学者竟说：“在法国，你可以批评总统，却不能批评毛泽东。”“五月风暴”打碎了二战后西欧“升平盛世”的神话，成为1968年甚至整个60年代左翼思潮和行动高涨的形象标志。人们甚至已经习惯于将1968年与1789年、1793年和1871年那些不朽的革命一样相提并论。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爆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

与第三世界和西方发达国家左翼的激进化相比，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却表现出一种或隐或现的趋于保守的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出现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各国在消灭剥削、发展经济、推进平等、捍卫和平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全世界进步力量感到鼓舞，也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惶惶不安。从50年代中期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对斯大林模式的全面反思已经开始，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对苏联模式着手改革。改革一度使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出现了盎然的生机，但也难免因各自的历史传统、地缘政治、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以及各自领导人的不同经历和素质等因素，产生了对改革的不同理解和实践，并因此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歧、分化甚至分裂。应当说，这种争论、分歧和分化是当代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它既给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损失，又推动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不论社会主义各国以及世界范围内各工人党、共产党取得什么成就，发生过什么曲折，都是社会主义运动从古典、近代走向当代的这历史必然性的反映。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大国、大党沙文主义曾一度有所收敛，但没多久便又故态复萌，并愈演愈烈，引起了社会主义各国各党的不满和反对。由于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由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所作所为，中苏两党的关系不断恶化，直到60年代初展开了影响遍及全世界的大论战。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被“和平演变”为一个修正主义的党，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欧洲以至亚洲、南美洲等一些党也已经被演变或处于演变过程之中；苏联等一些党的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是其国内新资